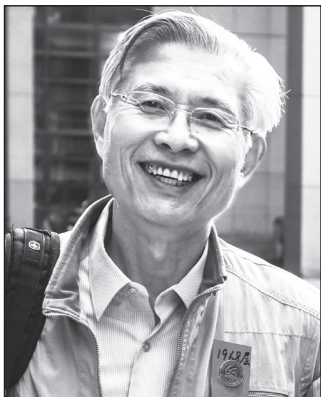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四清”中的人与事

○ 金水高（1968届工物）



五十周年返校留影
金水高学长毕业

“四清”的前半年，即1965年10月初到次年春节后，我在延庆县永宁公社国企工作队参加对公社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的“四清”。当时国企工作队的队长是学校体操队的张健，副队长有甄建军、李丹荻。队员则来自不同单位，以清华与北大的为主，还有几个地方的同志。来自清华的则又以代表队为主，记得有射击队的石应津，航海队的邹迎年，游泳队的丁正明，报务队的徐学媛等。北大的学生则一个也没有记住。来自地方的有一个是延庆县人民银行的，姓乔，我们称他乔老爷，人很厚道，后来我们还去过他家。另外一个老张、一个小张，老张是市里的干部，小张的年纪比我稍大些，好像来自北京市农机局，家住廊坊某县，经常一到周末就骑车回家。

当时的永宁公社，书记姓席，17级干部，据说参加过抗日战争，资格老，牛得很，也很倔，我们从心底里尊重他们。这回

搞“四清”却一个劲儿地要他们作检查，闹不好还要革他的命，人家能服气吗？我开始也感到不解，不过很快过去了，组织又让我参加了公社企业的“四清”。

永宁公社尽管第一把手的资格老、官衔高，但公社极其穷。所谓的企业，我记得也就是几家粉条厂，与其叫厂，还不如称为作坊。其中一家大一点的离永宁城不远，厂房是一排平房，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场院，拉着很多绳子，地上铺着席子，那是用来晾挂粉丝的。记得第一次我随张健去那家厂，好像还有石应津、邹迎年。开完会已经很晚了，回家的道路高低不平，天很黑要打着手电。张健就告诉我们，手电打开时不应紧贴身子，而应该远离身子两侧，否则阶级敌人会顺着灯光开枪，你就牺牲了。我觉得他真有学问，警惕性也高，对他佩服之至。

记得有一次，好像在10月的下旬，领导让我向企业干部职工做有关“23条”的讲解，我兴奋不已，觉得这是领导的信任。在家足足准备了两天，对照“四清”手册及“23条”，从为什么要搞“四清”到如何搞“四清”，写了好几页讲稿。可是当我满怀信心赶到会场，真的讲起来时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，在会上只讲了半个小时就发现没话说了，只好来回翻那几页讲稿和人手一册的“23条”，努力摆脱窘境。幸亏还有张健等人接着讲，进行动员，给我打了个圆场。

后来还有一次去最远的一家粉条厂宣讲“23条”。那个厂在远离永宁的一个村里

的小河边，就一个工人，是真正的作坊。我们与作坊老板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段时间，其实是想让我们检查他是否多吃多占、有贪污的行为。老头（其实也就四十多岁）对我们很好，经常给我们做小米捞饭，上面还浇点汤，有几粒黄豆大的面粉疙瘩，还带上几片绿菜叶，很是好吃。他总是把最稠的捞给我们，几天下来我也忘了我是干什么去的了，颇有点乐不思蜀。想想也很有意思，我们去查人家，人家给我们做好吃的，现在看来是否有贿赂的嫌疑呢？不过我们还是很认真的，最后也实在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回去交差了。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吃到了小米捞饭，现在每当在郊区农家乐看到小米捞饭，总要美美地吃上两碗。不过总感觉比起我在“四清”时吃到的可差老了。

国企的“四清”半年结束，春节后把我们“整建制”调到永宁小学搞“四清”。来自地方的老乔与老张、小张，他们只有半年的“四清”任务，结束后就回原单位去了。清华的学生悉数调来参加小学“四清”。张健不再担任队长，甄建军也走了，李丹获升任学校工作队的队长，记得他也是6字班的。副队长则是高教部政策研究室的任福昌，196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，年龄比我们大好些，我们都叫他老任。他说话时一口浓重的陕西口音，与我印象中的西北汉子大相径庭。他其貌不扬，戴一副深度眼镜，动不动就推一下，说话细声细气。在“四清”中，他很实事求是，从不把话说死，做人的思想工作很有一套，真不愧是搞政策研究的。我们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。文革期间，我们一直有联系，一直维持到我70年代末到北京上研究生以后。记忆最深的是1966年8月19日，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第二天，我去看他，中

午他请我在西单一家湖南餐馆吃饭。那时饭馆已经要求用餐者自己收拾吃过后餐具了，倒还没有让自己洗盘。他在送盘子时说，也许我们今后再也吃不到这样的好菜了。这话后来被不幸言中。

工作队增加的另外一个队员，是清华体操队的小于，水利系7字班的，一位多愁善感、充满同情心的姑娘，她眼睛大大的，水汪汪的，不会喝酒却一边一个酒窝，总让人觉得长错了地方。“四清”的前一半时间她在永宁公社太平街，听说与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大爷感情十分深厚，听到老大爷在大会上诉苦后，就一直将老人当做亲人，关心照顾老人的生活，即使离开了太平街，还经常跑去帮助打水做饭洗衣服，问寒问暖。一直到80年代他们还有联系，直至老人去世。每当说起这位老人，她的眼睛里总是饱含泪珠。

来工作队后，我们与她接触多了，发现她工作确实很细腻，做年青教师的思想工作也很有一套。当时永宁学校有不少来自北京市区的青年教师，是作为交换过来的，为期一年。自然也有永宁学区的教师去市里教书的。永宁小学有两位来自北京市区的年青老师，最后却没有回去，因为他们犯了“作风错误”，从此永宁小学多了两个北京来的“永久牌”。老师们都爱跟小于说真心话，就像见了亲人一般。小于是那样的懂人心，说话又是那样在理，即使是延庆土生土长的老师，见了小于那永远充满笑容的脸、那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谁不愿意跟她说说话？其实，那时我们都年轻，与学校的大部分老师年龄相差无几，有太多的共同语言，自然而然就成了朋友，有的直到以后很多年还有联系。十几年前，我们还与“四清”时我们发展的党员，后来担任延庆县建委主任的原永宁小学的老师一起团聚，他送给我们好多

□ 母校纪事

延庆的板栗。再说小于，文革后她分到了外地，后来由老任介绍，与他在教育部的一位同事结为夫妻，随后调入教育部基建部门。

在永宁学校搞“四清”仅半年时间，但还是有不少值得回忆的事情。当时永宁是一个学区，有一所中心小学，称永宁小学，管永宁公社和南张庄公社辖区内的若干所村校。我目前能记得的有南张庄的、新华营的、左所屯的等。与一群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教师在一起，白天他们上课，我们去听课，有时也客串一下教师。放了学，我们与男教师们交叉分组，去篮球场打一场篮球，你争我抢，谁也不让谁。晚上多数时间是学文件，自然得阵线分明，也不能交叉分组了，我们是工作组、教育者，他们是教师、被教育者，双方对面而坐。我们是抬着脑袋，他们则多半是低着头，再也没有打篮球时那样的高潮迭起。我们宣读文件，启发他们发言，他们往往总是低头不语，不像抢篮球那样积极主动。于是我们再启发，点名发言，他们只好拿出稿子，毫无表情地朗读一

遍。其实我们也没有非要他们说什么，也不会对谁的发言作好与坏的评论，甚至都没有听清他们在说些什么。这是必须的程序，一定要耗到至少9点才能散会睡觉。发言最积极的是一个摘了帽的右派，姓明，好像叫明岩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能在永宁小学这样的穷乡僻壤当上右派属于凤毛麟角，实属不易，说明此人绝不平常。遇到“四清”，总希望好好表现一番，从此解脱。谁承想，“四清”与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什么区别，作为文革的前奏与预演，相比以前的运动其左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由于文革突然而至，“四清”无疾而终，他的积极性也没有得到回报，不过我们也没有办法。

我记得“四清”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外调。学校中的一些老教师历史不清，或者家庭情况不明。记得有一位老教师，有人揭发他解放前当过伪警察，但是在档案里面没有记载。工作队把外调的任务交给了我，要求我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去查证落实。这倒让我有机会走遍了延庆的山山水水，

远的如四海、花盆、千家店，那是要坐公交车去的。离开永宁近一点的，如大观头、香营、旧县、大柏老、张家营，那就借一辆自行车出行。我带着介绍信，骑着车，在延庆县境内满世界转。好在延庆境内，除少数地方外到哪里都有工作队，而且都是清华学生及高教部干部的天下，都是蒋校长的门生、蒋部长的属下，工作起来还算顺利，也不用担心吃饭住宿。至于住宿，通常就在工作队员那里一挤。只



1966年1月，在“四清”前半年结束、地方的同志离开之际，在永宁照相馆拍摄。中排左3为金水高学长

是外调到末了什么都没有证明，后来伪警察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外调中最尴尬的事情发生在香营，当地“四清”尚未开始，还没有工作队。从永宁骑车到香营时已经很晚了。在公社食堂吃了点饭，公社也没有招待所，接待者将我介绍到公社人武部，部长很客气地将自己的床铺让给了我，他自己回家了。睡到半夜浑身发痒，总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上爬，当时太累太困，天气又冷懒得起来，在发痒处略微挠几下接着做梦，也就没有在意。第二天才发现，身上已经满是虱子。

外调时最紧张的事是在宣化下花园，当时要去涿鹿县黑山寺外调永宁小学党支部郑书记的家庭情况。他登记的是中农，可是有人反映他家是富农。从永宁去黑山寺要从下花园转乘长途汽车。我到了下花园，去黑山寺的公共汽车是在每日的早晨5点，必须住一个晚上，我头天就看好了从旅馆到车站的路线。房间内还有一个宣化人，也是一早要去长途汽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出行的，只是与我不同路。可恨的是，当我睁开眼睛他居然不辞而别了，黑黑的房间只剩我一人。当时是3月份，天亮得晚，也没有表不清楚几点了。我只好摸黑起来往车站赶，好在没有晚，否则又得等一天。在黑山寺住了两天，走访了不少居民，结果是没有材料证明他是富农家庭出身。老郑应该感谢我，给他洗刷了，出身在当时可是大事。

而最狼狈的事是坐车呕吐。那是去千家店外调小学副校长时，我与学校的一位老师同行。回来路上，我们坐的公共汽车是大篷车，就是解放牌卡车加上一个篷，后面是防尘用的一个帘子。从千家店往永宁是一路下山，山路蜿蜒蛇形，车辆一路狂行，乘客被颠得东倒西歪，我的胃也随车来回翻滚。快

到永宁时，终于狂泻而出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“四清”是一场悲剧，无论我们工作队员，还是对被整的干部群众。对我来说，作为人生的一个经历，长了见识，结交了朋友，对延庆产生了感情，一直关注着延庆发展的点点滴滴。现在每当打出租遇见延庆司机，听见延庆口音，都觉得十分亲切，总要与他们唠唠家常。与学校的老师更是结成了很好的朋友。文革期间我曾3次去永宁，其中两次徒步，都会去看看这几位老朋友。后来在70年代末，我考上研究生再次进京，曾多次去延庆旅游。后来我还因为组织写书专门住到延庆的旅馆，每次都与老朋友欢聚。即使是“四清”时挨整的永宁小学的王俊峰校长，与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。当时我们就觉得他是一位很好的管理者，很有思想，政治敏感性很强，能力也很强，就是有些傲。“四清”中我们除了在大面上让他参加学习检查外，没有给他难堪，一直让他继续工作，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。他也从来没有因为“四清”而记恨我们，在1966年9月，他还来到清华我的宿舍，与我们几位当时的工作队员谈文革，叙家常。

1966年6月初，传来清华党委靠边站的消息，我们急急忙忙结束了“四清”，于1966年6月13日从永宁回到清华。当天晚上，就赶上有人在西大操场东边的马路上揪斗张慕萍，我与几位刚从延庆回来的同学自然也是义愤填膺，上去责问了几句。记得主要是责怪他们把清华带“修”了，而我们则被他们领到了“沟里”，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，张慕萍在责难逃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轰轰烈烈的“四清”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轰轰烈烈的文革替代了，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2018年1月22日